



杨天石评说近代史



外患内忧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杨天石评说近代史

外患内忧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患内忧 / 杨天石著.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9

(杨天石评说近代史)

ISBN 978-7-5177-0310-5

I. ①外… II. ①杨… III. ①中国历史 - 近代史 - 研究 IV. ①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69600 号

书 名：外患内忧

著作责任者：杨天石

出版发行：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16 号 8 层 100037)

标 准 书 号：ISBN 978-7-5177-0310-5

经 销 者：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21

字 数：310 千字

版 次：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8.00 元

联 系 电 话：(010) 88919581 68990692

购 书 热 线：(010) 68990682 68990686

网 络 订 购：<http://zgfzcbs.tmall.com/>

网 购 电 话：(010) 88333349 68990639

本 社 网 址：<http://www.develpress.com.cn>

电 子 邮 件：370118561@qq.com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请向发行部调换

新 序

毛泽东 1935 年 10 月所作《念奴娇》词云：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毛泽东此词写的是亚洲中部的大山系，也是中国西部山系的主干昆仑山。它西起帕米尔高原东部，横贯新疆、西藏之间，蜿蜒伸展至青海境内，全长 2500 公里，平均海拔 5500 ~ 6000 米，宽 130 ~ 200 公里，总面积达 50 多万平方公里。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它被称为“万山之祖”，又被视为中华“龙祖之脉”。毛泽东在词中描写了它的雄伟阔大的气势和悠远绵长的历史，叙述了它对中华大地、中华民族的“功罪”，慨叹于“谁人曾与评说”。

昆仑山可以“评说”，历史、中国历史、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何尝不可以“评说”？

世界上大概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的老祖宗一样重视历史。历史被认为是正衣冠、知美丑的镜子，是辨善恶、考得失、增经验、长智慧的教科书，因此，它应该被人“评说”，任人“评说”，特别是自由“评说”。

首先是“说”。历史已逝，看不见，摸不着，只有靠历史学家“说”，用嘴、用文字或用图像，它才能广为人知，传之久远。历史学家要充分掌握资料，精细考辨，力争说得真实、准确、全面，尽最大可能符合历史本来面目，不能“胡说”。“胡说”的结果必然谬种流传，贻误读者。其次是

2 杨天石评说近代史

“评”。“评”能表现历史学家的理解、议论和价值判断。在“说”与“评”之间，“说”最重要。“说”是基础，只要“说”得真实、准确，广大读者都可以根据你所“说”的史实，做出自己的判断和评论。这一方面，我们要高度相信读者。多年来，我是主张先“说”后“评”、多“说”少“评”，甚至可以只“说”不“评”的。最不应该的是，不把史实说清楚、道明白，就急于将自己的评论强塞给读者。至于为了某种功利的需要或某种目的，有意掩盖、“虚无”、扭曲、夸大部分史实，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史实”，那就更等而下之，应该坚决反对了。

世无超人，现实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和不足。任何人都不可能一次就认识全部真理，同样，历史学家也不可能一次就认识全部历史真相。历史学家所“说”、所“评”，都可能不当、不妥、不全，甚至大谬不然。怎么办？百家争鸣呗！毛泽东所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艺术和学术的唯一办法，是清除谬误、探索真理的正确途径。利用行政权力，强制推行一花、一派、一种观点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害的。

如果从1958年选注《近代诗选》开始计算，笔者从事近代史研究已经57年。如果从弃文从史，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起计算，也已经37年。笔者所写论文、札记曾选编为“杨天石近代史文存”五卷本出版。出版后此套书一再加印，甚至被盗版。由于这套书部头大，读者捧起书像捧起一块大砖头，颇多不便，因此，台湾地区风云时代出版公司曾以“揭开民国史真相”为总题，改出七卷本。现在中国发展出版社以“风云版”所分为据，稍作调整，仍为七卷。应该说明的是，笔者2009年以后所作，因另有《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第二辑、第三辑等专书，本套书暂未收入。

书中“评说”难免谬误或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教。

杨天石

2015年8月于北京东城之书满为患斋

原 序

人们生活在今天，规划并创造明天，自然希望了解昨天。昨天就是历史，一切过去了的都是历史。

了解历史的最重要的办法是阅读历史著作。自然，这样的历史著作必须是真实的、客观的、公正的。假的或掺了假的历史著作，人们不会愿意看；讳饰或有所讳饰的历史著作，人们也不会乐意看。但是，历史著作要达到真实、客观、公正，并不容易。这是由于：其一，历史创造者的活动常常具有诡秘性，许多事件，策划于密室，进行于幕后，公开者、示人者往往一鳞半爪，半真半假，甚至全假。其二，历史本质的显露需要一段过程，在这一过程尚未终结之前，人们一时还难以全面认识其本质。其三，历史创造者分为不同的派别，各有不同的立场、观点，即使对同一事件，也常常会有不同的陈述和评价。其四，历史的记录者大都有自己的倾向、爱憎，其记录自然也难免反映这种倾向和爱憎，有某种偏见、局限、谬误、片面性在所难免。其五，许多事件没有记载，或挂一漏万，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所以，研究历史难，写出真实的、客观的、公正的历史更难。历史学家的可贵就在于能克服上述种种困难，尽最大可能为世人记录、再现、还原真实的历史本相。达到了这一境界，就达到了历史科学的基本要求。

然而，在现实中，人们常常并不将历史学看作科学，而是将之视为工具——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或者是一种宣传工具。例如政治家常常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利用历史来宣扬本派主张的正确，批评对立派别的谬误，或者

2 杨天石评说近代史

用来宣扬某种于己有利的观点，以期影响社会，塑造舆情，争取群众，为己服务。权力机构会为史家规定这样、那样的禁律：什么可以写，什么不可写；必须如何写，不能如何写之类。其结果是：有利于某派或某种需要者，张扬之，放大之，变造之，奖掖之；不利于某派或某种需要者，隐匿之，缩小之，扭曲之，禁绝之。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历史，往往妍媸随意，美丑随时，真正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哪里有真实可言，哪里有科学可言！

当然，历史学必须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服务。中国古代讲究经世致用，于史学，则特别强调其“资治”功能，这都是不错的。历史学如果不能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服务，要它何用！因此，本书著者赞成史家关注现实，“经世”“资治”，从这个意义上，著者肯定“工具”说的合理内涵，但是千万要注意，史学的这种功能必须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基础上，符合历史的真实和本质，无论如何不能也不应该违背历史，不能故意扭曲、剪裁历史以为己用。有些人常常不懂得，人们可以被蒙蔽于一时，但却不会被蒙蔽于永远。扭曲者有时会取得某种效果，但有时则反，其效果等于零，甚至是负数。林则徐有诗云：“青史凭谁定是非？”从人类发展的长河来看，历史的真相会大白，是非也会有公论。

本书著者年轻时志在文学，但造化弄人，最终走上了研究历史的道路。一转眼已经三十余年。面对历史学的汪洋大海，常生“去日苦多，所成无几”之叹。不过，有一点可以告慰读者的是，本书著者一贯以揭示历史奥秘、追求历史真实为鹄的，决不做讳饰历史、扭曲历史的勾当。当然，由于本书著者的局限，书中各文又成于多年中，自然也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问题甚至谬误，诚恳地希望专家、读者指正。民国史充满着政治斗争，治民国史有其特殊的困难。在这个领域内，政治的干扰和影响最多，未经厘清的史实最多，观点的对立和分歧也最多，本书著者的希望是：在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下，海内外学界切磋讨论，问难攻防，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使民国史著作的科学水平日渐提高，逐渐臻于真实、客观、公正。

著者

2009年8月3日于北京九华山庄

目 录

济案交涉与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开端

——读黄郛档案之一 1

在济案交涉过程中，蒋介石的对日、对外妥协性格已经须眉毕现，后来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路线正是由此继续发展的。

黄郛与塘沽协定善后交涉

——读黄郛档案之二 16

塘沽协定是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在塘沽协定善后谈判中，南京国民政府和华北当局坚持“不签字，不换文”，企图以此种方式逃避国人指责，同时则坚决不承认伪满洲国，并且为了防止有任何承认意味的事件出现，小心翼翼地进行了艰难的外交谈判。谈判中，黄郛并曾一度要求日方取消塘沽协定。

蒋介石与二次北伐 36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统治为北洋军阀所接替。前期北伐和二次北伐打倒北洋军阀，实现全国统一，完成了辛亥革命的未竟之业。

奉蒋谈判与奉系出关 46

二次北伐成功，辛亥以来北洋军阀长期统治中国的历史终于结束。它是国民党人的一个重大胜利，但是，也是土肥原“以晋代奉”计划的胜利。这是一个不无遗憾的结局。

2 外患内忧

“不抵抗主义”到底是谁提出来的? 65

张学良自称“爱国狂”，然而，在面临强敌进攻时却一再主张“不抵抗”。“不抵抗”当然是绝对错误的，然而，人们却不能不承认，就总体而言，张学良仍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 82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迅速占领东北全境，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受到普遍责难。同年12月，蒋介石被迫第二次下野。这是蒋介石一生中极为困难的时期，也是他开始调整国内外政策的起点。

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

——以蒋氏日记为中心所作的考察 100

蒋介石在对日步步退让的同时，又以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激励自己，进行抗战准备：对内，调整政策，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和地方实力派以及中共的矛盾，同时，建设西南基地；对外，广交朋友，联络盟国。

“约法”之争与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 124

蒋介石主张制订约法，胡汉民反对，蒋介石悍然软禁胡汉民，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进一步发展为个人独裁。自此，南京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仅存的一点民主气氛扫地以尽。

蒋介石拒绝以蒋经国交换牛兰夫妇 145

国民政府逮捕了共产国际间谍牛兰夫妇，宋庆龄提出，以苏联允许蒋经国回国交换。蒋介石虽担心苏方加害自己唯一的儿子，但还是坚决拒绝了宋庆龄的建议。

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及胡蒋和解

——读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所藏胡汉民档案 151

一旦突破隐语、化名等困难，人们就会从中发现大量 30 年代中国政坛内幕，特别是一个迄今尚不为人所知的秘密——胡汉民晚年，基于抗日和反对独裁的需要，曾经广为联络，组织力量，一再准备以军事行动推翻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政权。

一项南北联合打倒蒋介石计划的夭折

——台湾地区所藏阎锡山档案一瞥 189

西南方面既不能出兵北上，华北和各地的反蒋实力派自然不敢轻动。作为地方实力派，其中除部分人确实具有爱国思想，另一些人，为了自保，反蒋可，拥蒋亦可，抗日可，亲日亦可，完全视形势和条件是否于己有利而定。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抗日潮流

——读台湾地区所藏胡汉民资料 198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对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妥协政策的不满，国民党内或明或暗地翻滚着多股反蒋抗日的潮流。

1935 年国民党内的倒汪迎胡暗潮

——读台湾地区所藏胡汉民旅欧期间往来电报 215

国民党的中央全会和代表大会常常是各派政治力量的角逐场所。蒋介石确定在 1935 年 11 月召开四届六中全会之后，南京政府内外的倒汪派就将轰汪下台的希望寄托在该次会上。开幕之日，汪精卫突然被刺，倒汪派不战而胜。

张学良说：杨虎城是西安事变主角

——美国所藏张档新发现 228

张学良说：“那西安事变……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任。”从“陪衬”到“主角”，反映出张学良晚年对杨虎城在事变中的作用的新认识。

4 外患内忧

西安事变前后国共谈判史实订误

——评陈立夫《成败之鉴》，兼评他对于苏澄基的批评 234

回首往事时，不能过分相信自己的记忆。写作回忆录时，要千方百计利用档案文献资料，并作充分而严谨的考证。陈立夫关于周恩来致“二陈”函的回忆之误在此。

附录 255

张学良及其西安事变回忆录

——读张学良档案 255

孔祥熙所藏西安事变期间未刊电报

——读孔祥熙档案 269

济案交涉与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开端

——读黄郛档案之一

黄郛档藏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及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其中不少资料，沈云龙的《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和沈亦云的《亦云回忆》已加利用。但是，还有不少资料，尚未为人们所见。本文将根据这批资料，参考上述二书，讨论 1928 年的济案交涉。

在很长时期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对日妥协政策，其开端即是济案交涉。

一面抗议，一面斡旋

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中国北方仍为奉系军阀所统治。1928 年 4 月 5 日，蒋介石在徐州誓师北伐，进展顺利，但不久即遭到日本侵略者的阻挠。

4 月 16 日，日本驻济南陆军武官酒井隆少佐向参谋总长铃木庄六建议，再次出兵山东。同时，青岛总领事藤田荣介及代理济南总领事西田畊一也向本国陈述：出兵时期，业已到来。4 月 17 日，日本内阁会议讨论山东形势，决定以鲁军自济宁撤退及北伐军中断胶济路为由，断行出兵，由横须贺派陆战队赴青岛。4 月 18 日，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声称山东形势急转，内乱将波及日侨，出兵纯属自卫。19 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参谋总长铃木庄六奏请天皇出兵山东。当日，内阁召集临时会议，通过第二次出兵山

东决议。铃木旋即颁布命令，加派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率所部 5000 人从门司出发，向山东进兵；另以驻津之三个中队增援。

日本侵略者一向把山东看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政府的军事干预早有估计，力求避免冲突。4月18日，时任外交部部长的黄郛致电蒋介石，请于军事进行时，注意胶济路沿线日本侨民利益。日本政府出兵山东后，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一面抗议，一面斡旋的方针。

4月20日，黄郛与谭延闿、吴稚晖、张静江、叶楚伧等会商，决定向日方提出抗议。21日，黄郛通过日本驻南京领事照会日本政府称：“不独公法条约蹂躏殆尽，更恐因此酿成意外，责将谁归？”要求日本政府“迅将所拟派赴山东之军队一律停止出发”^①。23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临时会议，讨论对付日本出兵山东问题，通过《为日本出兵山东事致全体党员训令》。同日，国民政府委任蔡公时为战地外交处主任。蔡随即分函驻沪各国领事，声明国民革命军对战地各友邦侨民将尽力保护。24日，国民党中央常会就日本出兵山东，通过《告世界民众书》及《告日本国民书》，呼吁世界民众援助中国，要求日本民众遏止田中内阁的侵略政策。26日，黄郛训令江苏特派交涉员照会日本驻沪总领事，驳斥日方的“保侨”诡辩，要求迅将拟派山东之军队，一律停止出动。

在提出抗议的同时，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都力图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斡旋。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尚未与日本建交，在东京只有特派员殷汝耕一人，处理两国间的必要交涉，黄郛遂指令殷汝耕与日方洽谈。4月25日，殷汝耕会见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松井石根。松井称：日侨集中济南城西商埠区，遇有紧急情况，当撤至保护区内。松井并称：如张宗昌、孙传芳死守济南，拟劝其开城；如负隅青岛，拟劝其下野。他要求北伐军注意“勿与日军冲突，免计划成泡影”。殷汝耕随即将与松井会谈情况电告黄郛，

^① 沈云龙：《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版，第332~333页。

电称：“所议成否不敢必，惟力避冲突，杜彼借口，似属可能。”^① 27 日，黄郛随即将殷电内容转告在兖州的蒋介石。

殷汝耕资历尚浅，蒋介石意欲派张群以他的个人代表的名义赴日，同时命黄郛到前方会商。4月27日，黄郛到上海，与张群商量，认为张群时任上海兵工厂厂长，日本之行可能被外界误认为与购械或订约有关，影响内政外交。同日，二人电邀松井石根来华洽谈，但松井复电称：待北伐军占领济南后直接赴当地与蒋介石会见。松井表示，希望张群随往，并称：日本与山东关系密切，占领济南后，何人当局，望密示，最好由张群出任，否则亦盼由与蒋有密切关系的人出任。^② 其间，黄郛还在上海与日本驻沪总领事矢田七太郎谈话，矢田称：根据他所得训令及情报，在济南的日兵决不袒奉。又称：此次出兵，陆军与外务省之间有严重约束，倘在鲁日军有挑战或偏袒情形，请以事实见告，以便纠正云云。^③

由于蒋介石坚持要张群赴日，张群遂于4月30日东行。

蒋介石军前交涉的失败

5月1日，国民革命军克复济南。次日，蒋介石、黄郛先后抵达济南。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也于同日率兵600名抵达。

蒋介石抵达济南后，委任方振武为济南卫戍司令。方振武旋即会晤日军旅团长斋藤，声明负责保护外侨生命财产。5月3日，日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残杀国民政府驻山东外交特派员蔡公时等17人，烧毁黄郛办公处，并用大炮轰击北伐军。当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决定向山东增兵。

济南惨案发生的当日，蒋介石即严令部队不得还击，同时令城外的中

^① 《黄郛致蒋介石电》，1928年4月27日。黄郛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以下凡未注出处者，均同。

^② 《黄郛致蒋介石电》，载于沈云龙《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版，第336页。

^③ 《黄郛致蒋介石电》，1928年4月27日。黄郛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

国军队于下午 5 时以前撤离济南，并将此事通知福田彦助，请其约束部下。4 日，蒋介石应福田要求，派高级参谋熊式辉与日军参谋长黑田周一举行谈判。据熊式辉后来回忆，“对方一种骄横无人性的态度，并不是真心约来会商和解，似为故意对我加以激怒，求能扩大事态，阻碍我军之渡河北进”^①。黑田提出：①济南商埠街道，不许中国官兵通过；②胶济路与津浦路不许中国运兵；③中国军队一律退至济南 20 里外。黑田并称：“你是蒋总司令代表，请予签字。”熊式辉当答以须返后请示。同日，蒋介石将济南惨案经过电告南京国民政府。当夜，蒋介石与第一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朱培德、总参谋长杨杰及熊式辉等会商，决定分兵渡过黄河，绕道北伐。5 日，蒋介石仅留少数部队维持治安，本人偕黄郛退驻济南城外党家庄，同时函告福田彦助，盼其停止特殊行动，维持两国睦谊。6 日，蒋介石电饬北伐军各部：“举凡有碍邦交之标语与宣传，尤应随时取缔，勿以一朝之愤而乱大谋。”^②

日本侵略者并不因蒋介石的退让而稍戢凶锋。5 月 7 日，福田彦助提出五项条件，要求蒋介石在 12 小时内答复。条件为：①有关骚扰及暴行之高级军官，须严厉处刑；②对抗日军之军队，须在日军阵前解除武装；③在南军治下严禁一切反日之宣传；④南军撤至离济南及胶济路两侧沿线 20 华里外；⑤为监视右项执行起见，在 24 小时以内，开放辛庄、张庄兵营。同日，蒋介石派熊式辉、罗家伦赴济南，与福田彦助谈判，接受了福田所提部分条件：①蒋介石同意，在“调查明确”后，按律处分“不服从本总司令命令，不能避免中日双方误会之本军”。②本革命军治下地方，早有明令禁止反日宣传，且已切实取缔。③胶济路两侧 20 华里以内各军，已令其一律出发北伐，暂不驻兵。④辛庄、张庄兵营，暂不驻兵。同日，蒋介石下令免去贺耀祖的第三军团总指挥兼第四十军军长职务，算是在履行福田所提要求。

蒋介石只在几个问题上表达了和福田的不同意见。例如，蒋介石要求

^① 《熊式辉回忆录》，打字本，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

^② “济南日中军事冲突面面观”，载于《国闻周报》第 5 卷 18 期，第 5 页。

同样“按律处分”日本军队；济南及津浦路不得不驻扎相当军队，维持秩序等。此外，蒋介石要求交还前为日军阻留的部队及所缴的枪械。8日，熊式辉、罗家伦到达济南日军司令部。福田和熊式辉虽是日本陆军大学时的同学，但其态度傲慢，言语横蛮，“完全暴露出一种更无商量余地之狰狞面貌”^①，声称已经逾期，拒不讨论蒋介石所提对案。福田并提出最后通牒，声称“认定贵总司令并无解决事件之诚意，为军事之威信计，不得不采取断然之处置，以贯彻要求”^②。事实上，此前福田已下令轰击济南，破坏黄河铁桥，攻占辛庄营房。

福田的蛮横态度打碎了蒋介石以忍让求妥协的幻想。5月8日，蒋介石致电谭延闿及黄郛称：“中正至此，虽欲对福田继续谈判，亦恐无从着手。应请钧府立即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以此事实宣告全世界。”^③此电表明，蒋介石准备改变单一的军前交涉方式，企图开辟新的途径了

争取英、美出面干预

蒋介石企图开辟的新途径是以出让“优先经济利益”为条件，争取英、美出面干预。5月9日，蒋介石致电李济深，告以和福田谈判情况。电云：“国尚未亡，已受亡国待遇。弟必与诸武装同志服从中央训令，含泪忍辱，节节退让，并恐小不忍而乱大谋。但彼步步进逼，自江日起炮击不辍，济南一带，死伤遍地。虞（7日）占辛庄、张庄，庚（8日）逼党家庄，大有继续侵迫之势。万一退无可退，其将奈何！”蒋介石称：“能决此事，枢纽已不在军事，而在外交；不在前方军事，而在转移能力之英国。”他要求李济深派遣曾任广东省政府委员的朱兆莘赴港，与港督密谈，考察英、日两国是否协调，中国在不得已与日方破裂时，英国取何态度？有何法补救？

^① 《熊式辉回忆录》，打字本，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

^② 沈云龙：《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版，第342页。

^③ “蒋介石致谭延闿黄郛”，载于沈云龙《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版，第343页。

6 外患内忧

同时和英方共筹监阻、制止日本行动的策略。电称：“如能，则我方可与优先经济利益。沪英领职微，不如港督之易转移英内阁政策。总之，绝俄之后，必有与国。吾兄聘港，实具先见。如北伐成功，则对外自能次第解除束缚。”^① 该电注明：“百万急，限即刻到”，可见当时蒋介石惶急万分的状况。

其后，蒋介石又曾要求黄郛将福田条件交美国驻沪领事，请美领事从中调解。与此同时，谭延闿也致电日内瓦国际联盟秘书长德兰孟及美国总统柯立芝，要求他们调查公断，并以王宠惠、李石曾、伍朝枢为驻英、法、美代表，报告济案真相，争取国际支持。但是，这个时候，蒋介石还没有放弃和福田谈判的念头。5月9日，蒋介石听取熊式辉汇报后，再派何成浚与福田交涉，告以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祖“因不听我令，未能避免冲突，业经免职”；同意济南城内不驻兵，由武装警察维持秩序。当日，蒋介石致电谭延闿、黄郛，要他们立电张群，转请松井石根注意：“倘福田仍进逼，则中已至无可再让之地。”^② 其间，张群致电蒋介石，报告与田中义一会谈情况。田中称：不袒奉，至北伐将完成时，彼当助统一中国；不妨害北伐之进行，但他又表示，护侨、护路问题属于军事，由福田负责。^③ 蒋介石得到张群传递的信息后，极为高兴，于10日致电黄郛表示，如果日方能“不妨碍我津浦路交通，予以自由运输，则对于反日运动，中正可以极严厉手段阻止之。如此，则向来关系依然继续，且亦加厚。中正为增进睦谊计，亦可以向日军道歉，表示真诚也”^④。随后，蒋介石又致黄郛一电，要黄以自己的名义将上述意思转告矢田或电告殷汝耕，不要用他的名义。^⑤ 在外敌面前是孱头，在人民面前是恶煞，却又不敢挺身负责。黄郛夫人在帮助译电

① 《蒋介石致李济深电》，1928年6月9日。

② “蒋介石致谭延闿、黄郛电”，载于沈云龙《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版，第345页。

③ “张群致蒋介石、黄郛电”，载于沈云龙《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版，第345页。

④⑤ “蒋介石致黄郛电”，载于沈云龙《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版，第346页。